

10 3
朱光潜题

太倉文史資料輯存

朱光潜題



太仓文史资料辑存

第四辑

政协太仓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俞頌華先生逝世
四十周年紀念
博學多聞
治事不苟

梁漱溟敬題



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题词。

	氣	學
錢	度	問
昌	恢	三
照	宏	博
題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为纪念俞颂华先生
逝世四十周年题词。

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四辑）

目 录

纪念俞颂华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 椿萱哀思录.....俞湘文（1）
- 党的好朋友.....石西民（18）
- 诚恳宽厚 刚正不阿.....陆 诒（22）
- 大公至正 笔有风雷.....王淮冰（26）
- 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袁尘影（36）
- 深切怀念老师俞颂华.....穆家珩（38）
- 俞颂华与瞿秋白.....葛思思 俞湘文（46）
- 诗词一束.....孙恩霖 甘豫源（57）
- 浦琴南 李光宙（58）
- 忆唐公蔚芝琐事二则.....崔雁宾（60）
- 回忆唐公茹经书感.....郝增伟（62）
- 甘当绿叶衬红花——记陆景周先生.....黄汉文（65）
- 俞庆棠事略.....予 可 言 微（74）
- 回忆母亲在上海的一段往事.....唐孝纯（84）
- 太仓县民众教育实验区概述.....苍 石整理（90）
- 记张溥故居的修复与太仓博物馆的建立
——兼记唐文治纪念馆、俞庆棠纪念馆揭幕
.....陆光坤 郭松林（95）

椿萱哀思录

纪念先父俞颂华逝世四十周年
及亡母钱梅先周年祭

俞 湘 文

前 记



(图为俞颂华先生全家合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央党校文史资料室、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先后派员来沪向我母亲了解先父俞颂华生前与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交往事迹。中央电视台同志，还为我母录音录象。由于父亲在口，关于瞿等逸闻逸事，对家里人也都守口如瓶，母亲自难详告。隔了不久，母亲还说：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来信来人，要我们家属为先父写一长篇

《传记》，并说：“党不能湮没俞老先生的革命业绩”。但是父

亲生前同家人聚少离多，加以他平时既少谈及自己过去的事，又不苟言笑，我们也就不敢轻易向他问长问短，所以这一《传记》任务怎样进行？一时尚难着笔。

1983年春是先父九十忌辰，诸亲友、学生，纷纷撰寄纪念文章，缅怀旧谊。其中一部分载入北京《新闻研究资料》第22期上。

此后，石西民同志嘱托《新研》总编辑张钰来沪时，提醒嘱咐我们为先父搜集一本“文集”。承蒙胡愈之同志生前特为之写了序言，文中一开头就说“俞颂华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年逾九十高龄的梁漱溟、钱昌照两先生也题了词。还有的撰文题诗。该书是同我的老伴一起搜集成书后，已送交出版单位，正待编审付梓。

我父的“传略”散见于《中华民国人物史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第四卷、父亲的母校出版的《复旦大学志》、《1984年中国新闻年鉴》等书刊内。我们深深感谢三中全会后，党对抢救老一辈材料的重视。

现把有关双亲的点滴材料，就杂忆所及，有一写一，分述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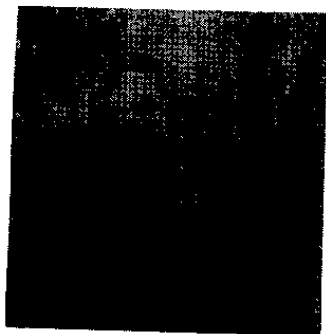
双 亲 身 世

先父虽出生在上海，但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隶属太仓。我的祖父和我的外公，年少时代，都在本邑考中了秀才，两人情深谊笃，结下了金兰之谱。祖父隶云公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后，改习电报业务，后来由上海电报学堂的教员、总办，晋升为上海电报局督办，并为家乡培育了不少电报业有用人才。外公钱菊人曾入仕途，告老后留住上海。但每年总要以族长身份回太料理一些族务，并主持家祠祭祖盛典。

俞氏族中的懿慈公和夫人，是袁云公的叔父母，不幸儿媳双亡，仅遗下一个孙女。故循例由我父作为嗣孙。我祖父母因为长子凤宾业已出嗣，故又将次子颂华算作“兼桃”俞氏两门的承继人。

懿慈公在太仓有田产遗给我父亲，所以父亲留学日本期间，虽然我祖母已去世，但他在经济上是较为宽裕的。我母常提到我父成婚后曾说到：“我一旦自立以后，决心放弃遗产，我俩要靠自己的劳动自力更生来养活自己。……”我母对此是永记勿忘的。

我父亲嗣份上原在太仓南门街（现已改名为“鸳鸯厅”）祖遗两进各三间房屋和两个天井。在这后面，是俞家另一族人的一所房屋。现下这些旧屋只剩下一进三间和一个天井了。



（图为俞氏旧居“鸳鸯厅”一角）

外公清末做过直隶省（今河北省）新安县知县，卸任后，在北京做过历任管理财政的官员，颇有政声。祖父则迁寓上海。1892年，双方的女眷，各自怀了孕，遂相约若各生一男一女，就

结为儿女亲家。次年，双方却各得一子。过了两年，外婆生下一女，即我母钱梅先。祖父母重提前约，就定了亲。

1916年，曾祖母在“鸳鸯厅”病危，说是若不见到嗣孙媳妇过门，她死不瞑目。那时男女双方，本无意急于成婚。但经不住各自家长的追促，父亲只得于是年年底，离日本回沪，去北京结



（图为俞颂华和钱梅先结婚合影）

婚。婚后，双双回到了上海，住进了老西门方浜桥陆园内俞氏的家门。我父体质瘦弱，据我母述及：他上私塾读书时，每晨吃一只粢饭团，酿成了一辈子的胃病。

由于新婚夫妇双双回籍，我嗣曾祖母终于在病榻上喜悦地见到了端庄文雅的刷新孙媳妇，一偿夙愿。婚后，我父又东渡留学了。

1917年秋，我父一度返国回沪，等待母亲生下了我，就重返日本去了。

次年夏，我父从东京学成回国后，生了一场伤寒重症。1919年4月进上海《时事新报》任副刊《学灯》主编。同年7月，我母曾劝其应我外公的推荐，去当北洋政府派驻苏俄海参崴外交特使处的日文秘书，不料去后却原船打回（详见本刊《俞颂华与瞿秋白》一文），我父仍回到原报馆工作。这才使母亲感到他热爱新闻事业，志不可夺。从此，凡父亲对任何职业之抉择与去留，她不再主动参与表示任何意见。

我父从1919年起，一直凭他的素愿行事，置高官厚禄于不顾。那时新闻事业和教育工作，乃是“清水衙门”，所以在齐卢战争时，双亲另立小家庭后，家中常闹“经济恐慌”。母亲只得时断时续地出外教书谋生，补贴家用。此后，时局动荡，通货膨胀。我母幸得我父早年学生、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的介绍，供职于中央银行充任文书工作，以赡家用。解放后，转入人民银行，1958年起享受了退休待遇，安度晚年。1986年夏，她突患中风，医治无效，溘然去世，享年92岁。

赴 苏 访 德

我父留学日本时，就倾心向往马克思主义。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他在张东荪和梁启超两先生的支持下，如愿以偿。他偕瞿秋白、李仲武两位，由上海《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委以特派员名义，同去苏俄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1920年10月16日他们三人从北京火车站起程时，我随着外婆去送行。母亲怀孕即将临盆，留家未去。耿济之、郑振铎等多人亦去送行。

我父此去苏俄约耽了半年左右，写了许多通讯：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作了如实的报导以飨读者。此后，他和瞿、李两位依依惜别，独自到柏林去了。

他的旅俄通讯是在柏林写完的。北京《晨报》上连载以后，深受读者欢迎，曾经汇编辑成《游记第二集》一书，多次再版。

他还继续写了《柏林通讯》，并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逻辑学、欧美各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常到柏林大学旁听，曾听过爱因斯坦的教课。

在柏林，1921年8月，留德同学会邀请他去作了一次访苏观感的演讲。这期间，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留日的老同学郭虞裳、笔友刘秉麟夫妇等；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朱家骅、吴经熊、金井羊等先生，也认识了朱德同志。他会见了德国总统兴登堡，又游历了欧洲各地，两赴法国巴黎。周恩来同志是他去巴黎时相识的。

那时他写给北京《晨报》的报导，是计稿论酬的。他唯一固定的薪金仅靠上海《时事新报》提供，经济来源渐生困难。1924年春，支助他的张东荪离开了《时事新报》，他受这影响，不得

不搭船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回到久别的上海。途中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译述了德国斯登堡所著的《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一书，于同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父在苏、德期间，家书鲜通。我母女俩留住北京不到两年。迨返抵上海，我们食宿方面虽由大家庭供给，可是其他生活费用，没有着落。姑母俞庆棠就介绍我母到万竹小学教书，后在思敬小学当抄写员，又到清心女校教课，还当过家庭教师。

我回到上海大家庭里有堂兄弟姊妹八人，和我年龄相近的有沛文哥、修文弟和钊文妹。大伯父母请来了家庭教师，我得以免费在家共读。后来，我母把我送进了务本女校，插入初小二年级。

海 外 归 来

我父子1924年初，终于从海外返回上海，合家都到船埠迎接。后来母亲含笑地对我说：“你父亲从日本回国后，见到长辈，总是象日本人那样行深深的鞠躬礼；现在从欧洲回来，见人就握手了”。从此，我父没有再添制过西装。一、二年以后，就一直身穿长衫，脚登布鞋。此时只见他又改用传统的拱手礼了。对客来访，便拱手相迎；相别时，他送到门外，又一面拱手，一面口称：“劳驾，劳驾”。

他海外归来时，张东荪已在主持中国公学，父亲受聘为该校的教务长兼教授，母亲就专理家务。

齐卢交战时，因老家在南市接近战区。大伯父母全家搬到租界暂避，我家则迁到公共租界爱文义路文德坊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底的下层。当时父亲叫我把蔡元培送他的亲笔行书横幅和于右任书赠的对联，都悬挂在客堂壁上。

数年后，我父与张东荪共进退，离开了中国公学。其时我父总是在家写文章，一家生活主要靠他的稿费收入。

大概在1928年的一天，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经宇），前来面邀相帮编务。我父进了《东方杂志》后，先后兼任了沪江大学等校的教授。在我九岁时，入培成女校读书，母亲生下了我弟彪文（已于1957年去世），加上父亲广交游，家用渐增，我母就向我父要求，经人介绍，她也进了培成女校初中讲授语文课。

父亲过去撰文，署用“澹庐”笔名为多，进《东方杂志》后，发表了许多国际问题的文章，均署名为“俞颂华”。于是声誉鹊起，被认为“国际问题专家”。在该社时，他和同道胡愈之、武培干、黄幼雄等抵掌论文，成为莫逆之交。

主编人钱智修自从离社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后，特来信相邀，许以监察委员，月俸大洋六百元。我父不慕荣利，复信谢绝，仍当《东方杂志》编辑。因他兼课，《东方杂志》社的月薪每月总是被七折八扣，祇剩百元左右。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要他主编《东方杂志》，他不愿将老朋友的“主编人”名义取而代之，借故推辞，仍居编辑之职。王云五就改请胡愈之为主编人。

1931年，上海“中社”创办了《新社会》半月刊。该刊从第二期起，主持人李孤帆请我父兼任主编，月给五十元。父亲接任后，开辟稿源，革新版面，在该刊上主张革新政治，抗日救国。使它在沪出版界中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刊物。同年年底，我家搬到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邻近闸北宝山路中兴里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内。母亲因离校路远关系，只得辞去了培成女校教务。

记得我在培成读到初中三时，学校里开了个专为海关培训职员 的班级，初三学生可直升该班，学成后由校保送进海关工作，

那是一只“铁饭碗”。我因眼看家中时常闹“经济恐慌”，向我父提出要想直升海关培训班。谁知我的话音未落，父亲厉声怒斥：“我不准你入海关谋职！我宁愿供你上高中，考大学；将来有条件的话，送你出国留学。”我被呆住了。随后，他若作解说地讲：“一个人呀，主要在于‘思想’。你看，象马克思那样，他的思想，不仅影响到现在，还将影响到千年万代”。我那里懂得当时的海关是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中，成为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只能听从父亲的教导，升学高中。

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闸北宝山路上居民，群相避难。父亲则听到接近官方人士的内幕消息，说是国民党当局已和日方妥协，将闸北地区拱手让人，不会打起来，因之父亲当时不肯离家，由于母亲苦苦相劝，一家四口才住进租界上外公家中，当夜，遥闻枪炮声，我十九路军奋起抗敌了。商务印书馆等以及我家旧居都毁于敌人炮火之下。

《东方杂志》不得不暂停发行。其时上海不少报刊也相继停刊。“中社”的《新社会》也难于维持，乃由俞寰澄提出愿意负担纸张、印刷费用，我父自告奋勇，愿尽义务，继续主编《新社会》，该刊遂得以照常刊行，热烈地支持宣传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此时父亲兼课的两个大学也被迫停课。我母亲为了兼顾家用，再度走出家庭，仍回到租界上的培成女校担任课务，又一次度过了全家生活的难关。

“黄 金 时 代”

1932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接受黄炎培建议，邀我父进馆，筹办兼主编《申报月刊》。当该刊第一、二期发行后，均供不应求而再版，成为当时销数很多的一个大型刊物。

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不少学术专家的作品，还刊登了茅盾的《林家铺子》和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原来取名“倒闭”，经我父亲去信征得作者同意后，改以《林家铺子》为篇名。又约请鲁迅先生为该刊撰文，当时化用“洛文”、“罗忤”等笔名，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杂文多篇。后来据曾由父亲引荐到《申报周刊》工作过的石西民同志来信告知，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充满民族正义感，又是开明的知识分子；《申报月刊》对当年推动左翼文化运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那时我家已迁到福煦路国民里。三十年代，瞿秋白到沪隐名埋姓进行地下工作时，曾来探望我父，且在我家住过。

1933年5月，《申报月刊》发行了第二本丛书《苏联研究》，（第一本为抗日名将翁昭垣著《淞沪血战回忆录》），介绍了苏联各方面的新建设。出版后的一天，苏联驻沪领事馆举行上海各界招待会，申报馆方面仅我父接到了请柬。那天傍晚，我父偕我母一起参与这次盛会。当他俩抵达领事馆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也在场，相与亲切握手后，郑重地对我父说：“我在莫斯科时曾见到过您……”

1933年8、9月间，我双亲参加了以马寅初为会长的“经济学会年会”，游历了泰山、崂山、青岛、曲阜、济南等处，并在孔庙摄影留念。在攀登一个山头时，马老健步领先登上了山顶，唯有我母也接着爬上去。

史量才先生遇害后，马荫良继承《申报》总经理。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我父主编。这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其间一度还任《申报》总主笔，仍带编《申报周刊》。他每天午饭后去报馆编《申报周刊》，然后到《申报》总主笔室办公，到深夜看了大样后，再写一篇社论，于清晨方能回家休息。如是者三个月。旋因种种关系，他自动卸去《申

报》总主笔之职，专心主编《申报周刊》。

此后，马荫良经理派我父亲及在周刊工作的王纪元、石西民、娄立斋等，以《申报》记者名义，先后分别去四川、湖北、广西、广东等处采访。

1937年4月间的一个早晨，马经理坐自备汽车，先接了《申报》记者孙恩霖后，再到我家来接我父亲，我也跟随他们一起驱车到龙华机场，送别我父亲和孙恩霖先生登上飞机。那时我却一点不知道他们是专程去延安采访，只知道他们是到西安去。

他们到西安七贤庄，由叶剑英去电话和延安联系后，即安排他们搭车到达延安。当晚毛主席在窑洞里接见，谈了八个多小时。孙恩霖先生到了延安方知我父亲和毛主席早在1919年主编《学灯》时就已相识了。我父亲带去了照相机，摄下了许多照片，有的是和中共领导人的合影，还有拍摄的肤施（即延安）城墙的照片，城门两侧“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大字标语清晰可见。后者刊载在1937年5月9日出版的《申报周刊》的封面上，而中共领导人的一些照片，新闻检查机关不准刊出。这些极其珍贵的照片，因八年的抗战离乱，未能保存下来。

父亲和孙恩霖先生回沪后，即以“本报记者”联名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报导，乃因新闻检查机关的阻挠而未能在《申报》上刊出。于是父亲以个人署名，以游记形式，又写了一篇《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刊载在1937年5月23日的《申报周刊》上。这篇通讯之能以刊出，是父亲先向邵力子请示通过的。但是负责新闻检查的陈训畬，又挽出潘公展亲自到《申报周刊》社和父亲“情商”。父亲那天回家后对我们讲：“我同潘公展吵得面红耳赤，我不许他来删稿，但结果还是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可是这篇报道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许多真情实况，并指出在延安看到了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父亲还简要地述及：“毛主

席说：抗日战争全面开展的初期，我国沿海地区，势必放弃；但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我前几次曾去湖北、四川等地采访，到处见到的都是官富民穷；唯有延安的领导人，都是军民同甘苦，毛主席吃的也是黑面片。我看，将来在国内取得最后胜利的，必是共产党”。

此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爆发前，父亲月薪所入约有二、三百元。自从马经理请他担任《申报》总主笔开始，每半年另给他五百元津贴。我父有次领到津贴后，带了我母女，接连两天，去戏院观看了程砚秋演出的“金锁记”和“春闺梦”。

这段期间内，在父亲一生中，无论在事业上和经济上，可说是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

流 离 颠 沛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父亲向马荫良建议到汉口去发行《申报》汉口版。一天他回家来对母亲说：“日本报纸上说我俞颂华是抗日分子。我预料上海今后即使租界地区，也将为敌人所控制，我就要到广州去了，帮胡文虎创办《星粤日报》后再说。你们去不去，由你们自己决定。”我母女商量后，决定合家都去广州。

父亲从在公共租界工部局里供职的好友许元方先生处，设法弄到了几张船票。那只轮船是德国政府派来接侨民回国的。我们在8月18日和同去协助创办《星粤日报》的邹云涛、符涤尘、汤福标等，一起上了轮船。船经日本的神户，到香港时，报社社长陈翔冰夫妇等都到码头迎接。午宴后，我们就搭广九铁路火车，到达广州。

其时，先已到广州并将任《星粤日报》付总编辑的孙起孟，

已将筹备工作办得基本就绪了。乃因日机连日轰炸，报纸无法出版。孙起孟先生等由粤汉铁路赴汉口，我们则搭船北上，于10月初到达汉口。全家居住在俞寰澄伉俪家中，他家对待我们亲如骨肉。父亲参加了《申报》汉口版编辑部的筹备工作。

同年年底，南京沦陷，汉口吃紧。寰澄先生设法先把家属以及我母连同子女们一起送到桂林。想不到父亲因为和筹办《申报》汉口版的负责人意见不合，于1938年春，随寰澄先生也到了桂林。

晚上，他向我母亲说：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已由南京迁到湘西芷江，该校新闻系教授马星野来信要他去该校任教授，并和新闻系学生一起编《芷江民报》。接着还说：“该校是国民党的党校，我是无党无派者，马星野在南京时曾屡次来信要我去，我都未同意；这次你看，我去呢还是不去呢？”这是我父一生抉择就业时和母亲唯一商量的一次。她看了马星野先生的来信，情意恳切，信中称父亲为半师半友，就说：“我们不能全家总是依赖寰老生活。我想，你最好带了湘文先去政校试试看，我和彪文暂时仍留在桂林如何？”父亲就带了我于1938年春搭了广西省专送画家徐悲鸿的轿车到长沙后，我们就到芷江去了。

一到芷江，该校实际负责人陈果夫大摆筵席，宴请全校教师，硬把父亲推到首席。以后，除请他任新闻系教授并和学生们一起办《芷江民报》外，还为他设了一门各系学生均可选修的逻辑学课程。

同年暑假，政校将迁重庆南温泉。马星野派人送我到长沙迎接母和弟，母亲和弟弟则由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江东平陪同到了长沙；接着，父亲来电要我们暂留长沙，马星野则又来电叫我敦促“俞师母”即去芷江。我们当时进退两难，最后还是决定去芷江。至则父亲动辄发脾气，也不讲清情由。想来是我们打破